



喻世明言

「明」

冯梦龙

编纂

张兵 校点

中州古籍出版社

前　　言

张　兵

时下，流行于世的“三言”排印本不下十余种，但当中州古籍出版社邀我重新整理和校点“三言”时，我还是欣然应允了。这一则是感动于他们的盛情，二则乃缘于我对“三言”的喜爱。

我喜爱“三言”，由来已久，最初的缘由是在故里乡村小镇上的一家茶馆中。

我生于上海市郊的一个小乡村。小时候，每天上学，都要从镇上的一家茶馆旁走过。一天放学后回家，我看那茶馆的门口、窗外挤满了人，大家凝神屏气地在聆听着什么。好奇心驱使我也挤进人群，才发现茶馆内的一位艺人正在说书。我偷眼瞧了下他背后左上方的墙壁上挂着的一块小黑板，只见上面写着《乱点鸳鸯谱》几字，就踮起脚，伏在窗棂上，听艺人演述这则动人的故事。不知不觉地，太阳已经下山，艺人的说书也告一段落，人们渐渐地散去了，可我还呆呆地伫立窗外，沉浸于刚才艺人演述的迷人故事中。直到茶馆的老板一声吆喝：“关门了！”我才如梦惊醒，回家吃过晚饭，仍在回味着艺人说的故事。说实话，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位艺人演述的《乱点鸳鸯谱》是“三言”中的一则故事。我只是觉得，除了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外，人生还有许许多多的精彩篇章。从此，我开始留意这家茶馆，凡有艺人演出，总是挤出时间去听。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也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从不拉下一节。因为买不起票，依旧站在门口或者窗外。那位好心的老板倒也不赶走我们。——时过三十多年，至今回想起当时的种种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可以说，故乡小镇上的那家茶馆，是我接受文学启蒙的好学校。

记得有一位哲人说过：小说是人生的伴侣。我十分推崇这一至理名言。在我四十余年的人生旅程中，小说给予自己的影响很大。它不但是我人生的忠实“伴侣”，而且也是极其亲密的“情人”。一天不读小说，心里总觉得丢了什么，仿佛人生就没有意义。而在各种各样的小说中，我比较爱读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三言”和“两拍”等话本小说，甚至是爱不释手。

在我国历史典籍中，最古老的图书目录大概要称是《汉书·艺文志》了。其中的《诸子略》中有“小说家”一项，提到了“小说”的起源问题：

2 前言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不灭也。间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节文字至少可说明以下三点：第一，小说之“小”的含义，它实为稗官所收，专供封建统治者政治上参考的市井间零细的琐语和传说等，所以“君子弗为也”，也就是说，那些具有远大抱负的仁人志士们是不屑于与“小说”为伍的，以免降低人格，跌掉高贵的“身价”。第二，小说虽“小”，但不会自生自灭，因为它有生存、发展的沃土和根基。其创作者和传播者皆为“道听途说者”，也就是普通民众们的“街谈巷语”。这就使“小说”深深地植根于人民之中，可以长生常青。再从小说的内容来说，“必有可观者”，也就是说，它具有新鲜、生动的生活兴味和蕴含着各种人生的意趣，所以深受市井细民的欢迎，使他们“缀而不忘”，留下无穷的艺术体验。第三，应该允许小说的存在，而不必采用扼杀之策。因为“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这当然是对统治者而言的，但也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要不是这种“开禁”政策，我国文学的百花园恐怕就要丧失“小说”这一重要的艺术品种了。

以后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小说，基本上是沿着《汉书·艺文志》的道路前进的。志怪也好，志人也好，它们都是对人生的探求。至隋唐五代时期，我国小说的发展有了新的飞跃。其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传奇小说的崛起。所谓传奇小说，实质是前代志怪和志人小说的合流，而其表现人物命运的主题则更加鲜明，在艺术上也自成结构，情节曲折婉丽，出现了众多的、即使用今天的现代小说观念来衡量也可称之为是“小说”的作品。它们与《汉书·艺文志》规定的小说性质相比，开始发生了某种裂变。其二是白话通俗小说（被后世人称为“话本”）的萌芽。由孕育于寺庙中的“变文”而来的，以《庐山远公话》为代表的一些“话”体作品，在“说话”艺人的演述下，成为宋元话本小说的前身。而《一枝花话》等那些由社会下层文人和庶民创造的小说的问世，则预示着市民——这一社会阶层开始登上文坛。至宋元时期的小说中，话本小说的创作已蔚然成风。小说也真正开始成为与诗、词、散文、戏曲等相映成辉的文学奇葩之一。

我国古代小说的鼎盛期是明清时代，它被人称为一代文学的代表。以《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词话》、《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镜花缘》以及鲁迅先生所说的四大“谴责小说”等一大批古典名著为代表的长篇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发展取得的辉煌实绩。即如短篇小说而言，文言小说有《剪灯新话》、《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白话小说则成众

星拱月之状，优秀之作枚举难尽。世情小说、神怪小说、历史小说、英雄传奇小说、侠义公案小说、社会问题小说……等各种题材皆备，展现了中国小说的璀璨世界。

作为中国小说发展重要“桥梁”的是话本小说的活跃。它肇始于唐代，发展于宋元时期，而至明末清初，则演进为黄金时期。仅在明万历到清顺治的四十余年问世的话本小说集就有二十多部。倘以单篇小说而论，则约有四百篇。至于在历史的尘埃中已佚失的小说更是无法估算了。一时间，“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蓄而人有之”（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一），这是那时的真实写照。风起云涌中的佼佼者，便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三言”。

在我国文学史上，被人称为“三言”的著作，是晚明时期刊行的三种白话短篇小说集《喻世名言》（又称《古今小说》）、《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的总称。这三种书共辑入了我国宋元时期至明代末年流布于社会上的各种白话短篇小说一百二十篇。其题材的广泛、内容的丰富、时代跨度的久远以及艺术的精湛，皆十分引人注目。“三言”是我国古代小说宝库中一颗耀眼的艺术明珠。它向人们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幅封建社会世俗生活的历史画面，成为我国中世纪时代的一面镜子。

打开“三言”，迎面扑来的阵阵艺术芬香让人留连忘返。它与以前各种小说的一个显著不同是：主人公为工商业者、手艺人等市民形象的小说，约占“三言”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我们看到：生活在这个小说世界中的商人、机户、染坊主人、酒店老板、铁匠、木匠、裱画匠、花农、瓜农、窑父、船主、磁工、渔夫、卖油郎、妓女等，都有着独特的风貌和杰出的才华。如《徐老仆义愤成家》中的阿寄，由经商而致富，硬是替“没脚蟹”孤孀颜氏撑起了一个大家业，远比大房、二房要神气得多。“富贵本无根，尽从勤里得。清观懒惰者，面带饥寒色。”此诗对他的经商道路作了充分的肯定和维护。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至唐代有了新的变化。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大量破产的农民进入城市，发展了封建社会中的商品经济，在都市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市民阶层。至宋元时期，我国都市的发展已相当繁华，市民阶层也不断壮大。在明代，这种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尤为迅速。以“三言”的编纂者冯梦龙的家乡吴中地区来说，曾经“闾塘辐辏，方瓦鳞鳞，城隅堞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渐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才辈出，尤为冠绝”（《寓圃杂记》卷五）。这里描述的虽然是明代中期的繁盛，但却是当时活生生的社会

现实。到了冯梦龙生活的晚明时代，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更是蒸蒸日上。“三言”中的小说《施润泽滩阙遇友》如实地描写了这一事实。小说中的主人公施复（润泽），原是江南盛泽镇上的小户，“家中开张绸机，每年养几筐蚕儿，妻纺夫织”，但他经营有方，“每年养蚕，大有利息，渐渐活动”，“几年间就增上三、四张绸机，家中颇颇饶裕”。透过作品的具体描写，可见晚明时期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一斑。而作者笔下的盛泽镇，显然是其真实缩影：“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生。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岸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余家，远近村坊织成布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仁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由此可见，《施润泽滩阙遇友》相当具体而形象地描绘了主人公施润泽从一个小手工业者到“冠于一镇”的大手工场主的发家史，表现了晚明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勃兴的景观以及新兴的市民阶层对社会变革的坚定信念和变革精神。类似的小说，在它以前的中国文学园苑中很难见到。“三言”的作者以其敏锐的识见，及时捕捉到这种社会新变动的信息，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形象的社会教科书。

“那个青春男子不善钟情？那个妙龄少女不善怀春？”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关于爱情和婚姻问题的描写，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历代文人骚客曾留下过许多不朽的篇章。然而，如此集中、具体地叙述平民百姓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种种悲欢离合，“三言”可说是为数不多的例证之一。在冯梦龙生活的时代，随着经济领域中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也带来了思想领域中的一系列剧变。我国传统的封建思想和观念，遭到了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思潮的巨大冲击。在人们普遍关注的爱情和婚姻问题上，市民们强调“情”是人生的动力，有着巨大的起死回生的力量。如袁黄就说过：“情联之则琴瑟埙，情走之则千里命驾，情迫之则等一死于鸿毛，指汤火而倍赴”，“情一往而深，无根而固”（《情理论》）。这一点，在“三言”中也得到了真实的描写。《乐小舍弃生觅偶》叙述乐和与顺娘相爱多年，却得不到父母的支持，直到钱塘江观潮时，顺娘意外落水，而乐和“纵身一跳”，下海救活顺娘后，才最终赢得爱情的故事。小说在交代乐和的救人动机时说：“他那里会水，只是为情所使，不顾性命。”这是全篇的“文眼”，点明其创作主旨乃在“崇情”。小说的结尾诗说：“少负情痴长更狂，却将情字感潮流。钟情若到真深处，生死风波总不妨。”这一对青年男女生死不渝爱情的思想基础，正是一个“情”字。乐和的“弃生觅偶”，显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三言”中，这类描写市民爱情和婚姻的小说，甚得人们重视。朱多福、周胜仙、白玉娘、小夫人、白娘子、刘宜春、爱爱等，与乐和一样，都是“情痴”的艺术

典型。他们身上焕发的思想异彩，和封建社会中的传统婚姻观迥然有别，其反封建思想的积极意义常为人所称道。再如小说《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的主人公张浩思想性格的主色调也是“情爱所重”。为此，他“不顾礼法”的束缚，勇敢地去追求意中人莺莺，并甘愿为之付出一切代价。这种背离传统道德规范的行为被涂上了时代新思想的油彩。比起脍炙人口的艺术佳作《西厢记》来，更具反封建思想的积极意义。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作者表示了对不幸失身女子的同情和谅解，以及对伪道学者所鼓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蔑视，原先那种束缚着人们婚姻自主的门第、贞操观念已不是主宰人物行为的思想准则。小说《卖油郎独占花魁》，展现了晚明时代市民在爱情生活中的力量。一个仅凭三两银子做本的区区卖油郎，竟能战胜满城恶少，“独占”临安城“天大名声”的花魁娘子，靠的是一片忠诚和老实厚道的热心肠。秦重和贵公子们不同，把妓女也当作值得同情和爱慕的人，给予关心帮助，尊重她的人格，赋予莘瑶琴以平等的爱和诚挚的心。这类小说，至今读来依然韵味无穷。

在“三言”描写的新兴市民的爱情王国中，也充溢着一股肯定“人欲”的激流。常为人称道的小说是《勘皮靴单证二郎神》和《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中的主人公韩玉连在烧香求愿时，见了丰神俊雅的二郎神塑像，竟然顿时“目眩心摇，不觉心里悠悠扬扬”，触动心中郁积的情感闸门说：“只愿将来嫁得一个丈夫，恰似尊神模样一般，也足称平生之愿。”乃至回家后，她仍“心中念念，只是想着二郎神模样”，一片春心，按捺不住，“欢娱嫌夜短，寂寞夜更长。”《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中，主人公田氏的情欲比起韩夫人来，更显得强烈和迫切。只因丈夫有“坟土干了，方可嫁”的遗言，所以她在丈夫坟旁拼命煽扇，以便早点嫁人。丈夫死后才七天，田氏就在灵堂和王孙调情，“心猿意马，按捺不住”，“恨不能一条细绳缚了那俏后生俊脚，扯将入来，搂做一处”。小说的这些艺术描写旨在说明：人的自然的、正常的、生理的欲望是任何力量抑制不了的。如果它得不到宣泄，就会生出许多是非之事，造成社会的不安定。这是和程、朱理学相对立的一种新思想，表明新兴市民对禁锢“人欲”的各种伪道学的反抗。此外，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玉堂春落难逢夫》等小说，还闪耀着尊重人格、追求自由平等的个性解放思想的光彩，这些都早已为人们所熟悉。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妇女作为男子的附属物，地位极为低下。“三言”对此作了否定和批判。如《苏小妹三难新郎》一反男尊女卑的偏见，认为“若许裙钗应科举，女儿那见逊公卿？”并列举曹大家、蔡琰、谢道韫、上官婕妤、李易安、朱淑真等历史上的杰出妇女，表明了作者进步的妇女观。《赵春儿重旺曹家庄》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又仗红颜再起家”的故事。小说通过曹可成由穷变富的历程，

赞扬妓女赵春儿助夫成家的美德，盛称“如此红颜千古少”。而忍辱报仇的蔡瑞虹（见《蔡瑞虹忍辱报仇》）则被作者披上一件美丽的外衣。她在全家遭致杀身之祸时，能处变不惊，凭藉其非凡的“智识才能”和美艳的容貌，在厄运中终于报了家仇。诸如此类的艺术形象，成为“三言”奉献给我们的一笔精神财富。

“三言”还揭露了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及封建官吏的丑恶面目。如《沈小霞相会出世表》、《张廷秀逃生救父》等小说，通过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暴露了封建社会末期“一切都烂透了”（恩格斯语）的黑幕，从而彻底撕开了罩在他头上的那层光圈。在这类作品中，作者既对那些“恃宠贪虐、罪恶如山”的官吏，如严嵩父子、贾似道、路楷、杨顺、金满、杨洪、汪岑以及恶霸张委等作了无情的鞭挞；又对那些正直、忠良、见义勇为、敢于斗争的官员和市民，如沈炼、秋先、李白、卢楠、张廷秀、钟义等作了热情的赞扬。《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则表现了“官逼民反”的思想主题，把一个失败了的起义者誉为“烈烈轰轰”大丈夫，隐含着某种思想上的“异端”精神。此外，在那些公案小说和有关“发迹变泰”的小说中，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民群众要求廉明的政治和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亦较为引人注目。

诚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三言”在思想内容上也存在着若干“糟粕”。如个别小说的宣扬忠孝节义、封建迷信和宿命论思想等。就是在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中，也往往美丑相掺，鱼目混珠。这无疑是其不足之处。平心而论，这些不足，比起“三言”取得的思想成就，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况且，从透视封建社会的角度看，我们从中又可寻觅到某种历史文化资料。从这一意义说，它们亦非一无可取。

我喜爱“三言”，还常常折服于它的艺术审美价值。

黑格尔说过：小说是“关于现代民族生活和社会生活在史诗般领域有最广阔天地”的一种文体（《美学》卷三）。“三言”在准确、生动地反映我国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和民族文化精神的同时，也继承了我国古代美学传统，呈现独特的富有鲜明个性和无穷魅力的艺术风貌。

“三言”的作者大多具有编织故事的高超艺术，这是人们最为称道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论及文学的结构艺术时，曾提出“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和“杂而不越”的要求。这对“三言”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纵观“三言”，可以看到话本作者将采撷到的各种最有意义、生动的事件，发挥“天才建筑师”和“文学裁缝匠”的杰出才能，加以合理的剪裁和巧妙的安排，以达到摄魂夺魄的艺术效果。他们“于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

收拾；冷淡处提缀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罗烨《醉翁谈录》）。大致说来，这些高超的故事编织艺术，一是单线式的纵向发展，故事有头有尾，脉络分明，于平铺直叙中时见细密谨严；二是双线式的交叉推进，转折有绪，前后照应，于跳跃跌宕中顿现路转峰回；三是辐射式的齐头并进，细针密缝，百川归海，于纷繁多变中叠起层层波澜。在安排情节时，或较多运用巧合法，简化故事的漫长进程，加强矛盾冲突的紧张性，使作品主题更为鲜明；或运用各种“细节性”的小道具，纽接生动、曲折的故事，丰富情节，增加戏剧性；或设置“悬念”，安排伏线，使情节曲折有致，引人入胜。在“三言”中，这类成功的例证随处可见。如《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就是一篇运用“巧合法”结构故事的小说。王翁给刘贵十五贯钱，让他作经商的本钱。崔宁卖丝所得，也“恰好是十五贯钱，一文也不多，一文也不少”，两者的“巧合”，显然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小说结尾描写：劫掠王氏的静山大王恰是偷窃“十五贯钱”的强盗，这一神来之笔，更是作者的匠心独运。表面看来，这类“巧合”仿佛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其实，在生活中经常会有各种“无巧不成书”的事，意想不到的“巧合”中，往往隐藏着必然性的东西。所以，小说创作只要做到巧得自然、真实、可信，就能获得读者的认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只要从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中，寻找到最有表现力的偶然形式，就能揭示深刻的思想意蕴。也正因此，艺术才充满生机和活力。

捧读“三言”，人们往往赞叹于小说中塑造的那些独具鲜明个性的艺术典型。如杜十娘、秦重、蒋兴哥、王美娘、秋先、周胜仙、施润泽、张廷秀等等，个个栩栩如生，凸现眼前。如《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的主人公苏三，在作者笔下，被刻画得何等活灵活现：既天真，又刚强；身在黑色的染缸中，可又不甘沉沦，看似“可怜”，其实富有反抗精神；灵魂虽被扭曲，但人性尚未泯灭。她身处封建社会的重压，仍不懈追求幸福生活。相遇王景隆后，机智勇敢地和邪恶势力斗争，真是“红粉亦英雄！”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小说家在表现他（她）们时，也绝少雷同。如杜十娘和苏三，曾经有过相同的生活命运。但作品在描写她们与旧社会的抗争时，运用各不相同的方式，从而使两人具有各不相同的性格特征。同是妓女出身的赵春儿，助夫成家，与苏三、杜十娘相比，更是迥异，在她身上折射出“红颜”们的高风亮节和智慧的光辉。“三言”在创造人物形象时，运用了各种艺术手法，如将人物放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在典型环境中塑造人物典型；通过富于个性化语言和动作的描写；精微细腻的心理刻划；“不务装点，而情态反如画”的白描；运用对比、映衬、烘托和情景交融等等，才使全书永久地闪耀着艺术的青春。有一种意见认为：“三言”中虽然活跃着各种生动的艺术典型人物，但他们还只是展开故事情节的工具，我们对此不能评价过高。从我国文

学人物形象史看，这话不免有点偏颇。诚然，“三言”中的小说大多以故事的精致和情节的奇巧见长，但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人的活动却始终占据着小说创作的重要地位。或者说，故事依赖人的活动而存在，而人的性格特征则靠故事的发展逐渐鲜明。这体现了中国艺术美学前进的一个重要标志。即使和同时代的《金瓶梅词话》等文学名著相比，“三言”创造人物艺术形象的历史贡献亦不逊色。

“绿天馆主人”在《古今小说叙》中说：“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胆，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如之乎？”这“通俗”两字，确是“三言”小说语言的基本特点。因为在作者们看来，“话须通俗方传远”，为了使话本小说植根于民众的沃土，其语言必须具有活泼泼的表现力和生命力。试举一例：

那女子接得在手，才上口一呷，便把那个铜盂儿望空打一丢，便叫：“好！好！你却来暗算我。你道我是兀谁？”那范二郎听那女孩儿道：“我是朝门里周太郎的女儿；我的小名叫做胜仙小娘子，年一十八岁，不曾吃人暗算。你今却来算我，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

这段艺术语言，见于《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小说叙述樊楼酒店中的少女周胜仙，对青年范二郎一见钟情，但囿于封建礼教，不敢向意中人表露心迹。然而，她又不愿白白错过大好时机，遂借喝糖水为契机，故意向范二郎传情。范二郎也很快从这番话中领会了她的“弦外之音”，也用同样的方式自报“家门”。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言，一对青年男女，成功地将人生中最隐秘的感情，在最难表达的场合，用一种异乎寻常的形式，向对方作了最微妙的交流。这段小说语言，声情并茂，独具个性，活现了“这一个”怀春少女的鲜明形象，令人过目难忘。

搜集于“三言”中的小说，人们一般称其为“拟话本”，系由“话本”发展而来。话本小说和其它小说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它的讲述性。据《梦粱录》、《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当时城镇的瓦舍勾栏、茶肆酒楼、露天空地、街道寺庙等，都是“说话”艺人们经常演出的场所。在这种艺术表演的实践中，话本小说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艺术体制。对此，已故的胡士莹先生曾将其归纳为：题目、篇首、入话、头回、正话和篇尾六个部分。尽管“三言”中的小说由于文人的参与创作而流露若干书卷气，但它的艺术体制基本一如其旧。这种艺术体制不仅适合话本小说自身的发展以及市民的审美心理，而且对以后的戏曲、小说等艺术形式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如戏曲，一般都是前有“楔子”，后有“题目”、“正名”，中间才是戏文内容。这种艺术形式显然受到了话本小说的启迪。

此外，在人物的上、下场或戏剧终了时，往往先简要地介绍主人公的姓名、籍贯、经历以及家庭情况，或用“正是”、“散场”等字样，两者的相似之处，不言自明。再如，我国古代中、长篇小说的艺术形式，和话本小说更是如出一辙。且不说那些直接承袭和模仿话本而创作的拟话本小说，就是以《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词话》、《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小说名著，在艺术形式上也和话本小说相通相生。这一切都说明：“三言”中话本小说的基本艺术形式，奠定了我国叙事文学发展的基石。直至今天的文坛，我们还不时会看到它的余绪和流波。“三言”对于形成我国近代小说艺术美学的发展功不可没。

关于“三言”的编纂者，一般认为是冯梦龙（1574—1646年），字犹龙，别号茂苑野史、龙子犹、顾曲散人、墨憨斋主人等，为晚明时代著名的通俗文学家之一。他于崇祯年间由贡生选授福建寿宁知县，清兵渡江时，参加过抗清活动，在思想上深受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潮流影响；一生重视小说、戏曲和各种通俗文学，曾编纂过《山歌》、《桂枝儿》、散曲集《太霞新奏》、笔记《古今谈概》、《智囊》、《情史》、《笑府》等；又改写小说《平妖传》、《新列国志》等，另修订戏曲《墨憨斋定本传奇》，创作传奇《双雄记》等。“三言”是冯梦龙晚年所编，并由此使他赢得隆盛的声名，从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我读过的部分论著和论文中，不时有人把冯梦龙视为“三言”的作者。我认为，“编纂者”和“作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应混为一谈。这样说，并非贬低冯梦龙对中国文学所作的杰出贡献，而是缘于对事实和历史的尊重。前几年，海外有学者对《醒世恒言》的编纂者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它与冯梦龙的朋友席浪仙有密切关系。这一见解颇能启迪新智，值得深入研究。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不应排斥这种可能性。但要定谳，似还需要寻找新的证据。与此相关的是“三言”中各篇小说的作者问题，目前在研究者中也有歧见。人们能确证为是冯梦龙创作的小说，只有《警世通言》卷十八的《老门生三世报恩》一篇。其它若干篇小说，虽有人撰文把其著作权归于冯梦龙名下，但同样因拿不出过硬的证据而存疑。

“三言”刊行于明末天启年间，出版者天都斋主人在《古今小说》原刻本的扉页上曾有广告说：“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分之一为初刻云”等语，可见《古今小说》（又称《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三书原是一有机的整体，书商为了便利出版和销售而将它们分成三集。各书正文前均有冯梦龙写的“序”一篇（《古今小说·序》署名“绿天馆主人”，《警世通言·叙》署名“无碍居士”，《醒世恒言·叙》署名“可一居士”，三者都是冯梦龙的化名。对此，已故的陆树崖老师考之甚详），对我们了解“三言”的编纂情况甚

有裨益。冯梦龙在编纂“三言”时，曾“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进行艺术加工，乃至是再创作。但具体情况又当另行分析。据我的初步考证，“三言”中辑入的宋元话本有二十五篇。它们是《古今小说》卷十一、十五、二十、二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八共七篇；《警世通言》卷七、八、十、十四、十六、十九、二十、二十九、三十、三十六、三十七、三十九共十二篇；《醒世恒言》卷六、十三、十四、十七、三十、三十三共六篇。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不能一一申述其理由。而其它的九十五篇小说，在没有可靠的材料证明它们确切的著作年代前，似可视为明代作品。诚然，由于历史资料的匮乏，加上话本小说成型过程的复杂难辨，我的上述看法不一定正确。但有一点则可以肯定：冯梦龙在把那些“宋元旧篇”编入“三言”时，基本上未作改动，仅作了少数文字的增删，较完整地保存了早期话本的原貌，而其它小说的编纂情况则较为复杂。现代学人一般认为，“冯梦龙汇刊‘三言’，曾经作过审慎的去芜存菁的遴选工作，还把明代艺人作家和他自己的作品也编了进去，在不同程度上作了一番整理、加工，把文学风格统一起来”。（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这是大致可以信从的。如《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小说，源自《六十家小说》中的《柳耆卿诗酒玩江楼》。原作描写柳永在赴任途中，见了周月仙，“春心荡漾，以言挑之”，因遭拒绝，设计让舟人去船中对她奸淫，行为卑劣。而经过冯梦龙的妙笔生花，这则故事中的主人公柳永，变成一个受众多姬讴歌的正面人物。小说突出地描绘了这位落拓文人和妓女之间的“真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然而，在经过冯梦龙润色的作品中，也有不可避免的失败。如《乔彦杰一妾破家》小说，源于《六十家小说》中的《错认尸》篇，将它和原话本相比，冯梦龙在结尾增加了乔俊阴魂向仇人索命的情节，过多地强调了因果报应的封建宿命论，其思想意义远逊于原作。由此观之，我们在评论冯梦龙编纂“三言”的贡献时，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下面简单说一下这次整理和校点“三言”的情况。

《古今小说》（又名《喻世明言》）四十卷，现有明天启年间的天许斋刊本，图四十页，记刊工曰“素明”，藏日本内阁文库。另，日本尊经阁文库藏其复刻本，有缺页。大连图书馆藏有一个残抄本，系日本人据映雪斋本所抄，题“七才子书”，仅存十四篇。

《警世通言》四十卷，现有明金陵兼善堂刊本，图四十页，藏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库及日本人仓石武四郎处。另有衍庆堂本和三桂堂王振华本，均有残缺。

《醒世恒言》四十卷，现有明叶敬池刊本，藏日本内阁文库，扉页题“醒世恒言”四字，右上题“绘像古今小说”六字。另有衍庆堂本两种和叶敬溪本存世。

1958年，台湾世界书局曾据李田意先生摄自日本的《古今小说》天许斋本，《警世通言》金陵兼善堂本和《醒世恒言》叶敬池本，出版了“三言”的影印本。该本曾对现存“三言”上述诸本的错讹，作过初步校订，是迄今为止存世的最完整和流布较广的“三言”影印本。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据台湾世界书局本影印出版，在国内刊行。

这次整理、校点“三言”，即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影印本为底本，相关篇目曾参考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的影印本、《今古奇观》的明刊本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和岳麓书社等近年出版的诸种排印本，改正了若干错讹。对前后文字及目录与正文的相异之处，作了统一和调整。如《古今小说》卷三十七，天许斋本正文题作《梁武帝累修归极乐》，与目录《梁武帝累修成佛》不合，现作了统一。《警世通言》卷二十二《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中女主人公宜春，个别处误为“宜男”，卷二十五《桂员外穷途忏悔》中主人公桂迁，有误作“桂生”的，现亦作了统一。同篇“元朝天顺年间”，底本误为“大顺年间”，显系刻工所误，现一并作了订正。囿于本书体例的限制，在此不能一一指出各订正之处。另，《古今小说·叙》中“虽日诵《孝经》、《论语》”句，一般皆作“虽小诵《孝经》、《论语》”，显与原意不符。现经仔细揣摹底本文字及文意改正之。《醒世恒言》卷十三《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中叙述韩夫人之病，有一首词，底本缺“香魂至今迷恋，向真仙消息最分明。风夜相逢何处，清风明月蓬瀛”八字，现则据叶敬池原刊本作了补正。此类改动，还有一些。此处不作一一说明了。同时，在整理和校点“三言”时，考虑到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改正了底本中的刊误字，并对异体字、俗体字及其它不规范的用字，径改作通行的规范字。凡繁体字，一律改为简体字。底本中另有少量同音假借字，乃当时的普遍用语，有利于体现原作的文字风貌，一般不作改动。“三言”诸本，均有为数不少的“眉批”和少量的“行侧批”，据初步考证，可知它们均出自冯梦龙之手。这些文字，于理解各则小说的思想和艺术等多少有点裨益，故一并逐录于文中。对底本上今已辨认不清的个别文字，则用□表示，标点也系笔者所加。三桂堂本《警世通言》卷四十，题为《叶法师符石镇妖》，文字与金陵兼善堂本《警世通言》卷四十《旌阳宫铁树镇妖》迥然不同，且不易找到，经整理后“附录”于后，以供参考。以上几点，特作说明，并祈有识者教正之。

叙

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吴越春秋》等书，虽出炎汉，然秦火之后，著述犹希。迨开元以降，而文人之笔横矣。若通俗演义，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养。仁寿清暇，喜阅话本，命内珰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酬。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倩人敷演进御，以怡天颜。然一览辄置，卒多浮沉内庭，其传布民间者，什不一二耳。然如《玩江楼》、《双鱼坠记》等类，又皆鄙俚浅薄，齿牙弗馨焉。

暨施、罗两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要以韫玉违时，销熔岁月，非龙见之日所暇也。皇明文治既郁，靡流不波，即演义一斑，往往有远过宋人者。而或以为恨乏唐人风致，谬矣。食桃者不费杏，烯穀者不弃锦，惟时所适。以唐说律宋，将有以汉说律唐，以春秋战国说律汉，不至于尽扫羲圣之一画不止！可若何？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纯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余顾而乐之，因索笔而弁其首。

绿天馆主人题

目 录

叙	(1)
第一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1)
第二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22)
第三卷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36)
第四卷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46)
第五卷	穷马周遭际卖馄饨	(55)
第六卷	葛令公生遭弄珠儿	(60)
第七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65)
第八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70)
第九卷	裴晋公义还原配	(78)
第十卷	膝大尹鬼断家私	(85)
第十一卷	赵伯升茶肆遇仁宗	(97)
第十二卷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103)
第十三卷	张道陵七试赵升	(110)
第十四卷	陈希夷四辞朝命	(119)
第十五卷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125)
第十六卷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139)
第十七卷	单符郎全州佳偶	(144)
第十八卷	杨八老越国奇逢	(150)
第十九卷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	(159)
第二十卷	陈从善梅岭失浑家	(168)
第二十一卷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	(175)
第二十二卷	木棉庵郑虎臣报冤	(192)
第二十三卷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209)
第二十四卷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215)
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225)

2 目 录

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230)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238)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245)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252)
第三十卷	明悟禅师赶五戒	(261)
第三十一卷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271)
第三十二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诗	(281)
第三十三卷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288)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298)
第三十五卷	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303)
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311)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成佛	(326)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为神	(339)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349)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365)

第一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仕至千钟非贵，年过七十常稀。浮名身后有谁知？万事空花游戏。
休逞少年狂荡，莫贪花酒便宜。脱离烦恼是和非，随分安闲得意。

这首词名为《西江月》，是劝人安分守己，随缘作乐，莫为酒、色、财、气四字，损却精神，亏了行止，求快活时非快活，得便宜处失便宜。说起那四字中，总到不得那“色”字利害。眼是情媒，心为欲种。起手时，牵肠挂肚；过后去，丧魄销魂。假如墙花路柳，偶然适兴，无损于事；若是生心设计，败俗伤风，只图自己一时欢乐，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假如你有娇妻爱妾，别人调戏上了，你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

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

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

看官，则今日听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可见果报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个榜样。

话中单表一人，姓蒋名德，小字兴哥，乃湖广襄阳府枣阳县人氏。父亲叫做蒋世泽，从小走熟广东做客买卖。因为丧了妻房罗氏，只遗下这兴哥，年方九岁，别无男女。这蒋世泽割舍不下，又绝不得广东的衣食道路，千思百计，无可奈何，只得带那九岁的孩子同行作伴，就教他学些乖巧。这孩子虽则年小，生得：

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行步端庄，言辞敏捷。聪明赛过读书家，伶俐不输长大汉。人人唤做粉孩儿，个个嫌他无价宝。

蒋世泽怕人妒忌，一路上不说他是嫡亲儿子，只说是内侄罗小官人。原来罗家也是走广东的，蒋家只走得一代，罗家倒走过三代了。那边客店牙行，都与罗家世代相识，如自己亲眷一般。这蒋世泽做客，起头也还是丈人罗公领他走起的，因罗家近来屡次遭了屈官司，家道消乏，好几年不曾走动。这些客店牙行见了蒋世泽，那一遍不动问罗家消息，好生牵挂。今番见蒋世泽带个孩子到来，问知是罗家小官人，且是生得十分清秀，应对聪明，想着他祖父三辈交情，如今又是第四辈了，那一个不欢喜。

闲话休题。却说蒋兴哥跟随父亲做客，走了几遍，学得伶俐乖巧，生意行中，百般都会，父亲也喜不自胜。何期到一十七岁上，父亲一病身亡，且喜刚在家中，还不做客途之鬼。兴哥哭了一场，免不得揩干泪眼，整理大事。殡殓之外，做些功德超度，自不必说。

七七四十九日内，内外宗亲都来吊孝。本县有个王公，正是兴哥的新岳丈，也来上门祭奠，少不得蒋门亲戚陪侍叙话。中间说起：“兴哥少年老成，这般大事，亏他独力支持。”因话随话间，就有人撺掇道：“王老亲翁，如今令爱也长成了，何不乘凶完配，教他夫妇作伴，也好过日。”王公未肯应承，当日相别去了。众亲戚等安葬事毕，又去撺掇兴哥。兴哥初时也不肯，却被撺掇了几番，自想孤身无伴，只得应允。央原媒人往王家去说，王公只是推辞，说道：“我家也要备些薄薄妆奁，一时如何来得？况且孝未期年，于礼有碍。便要成亲，且待小祥之后再议。”媒人回话，兴哥见他说得正理，也不相强。

光阴如箭，不觉周年已到。兴哥祭过了父亲灵位，换去粗麻衣服，再央媒人王家去说，方才依允。不隔几日，六礼完备，娶了新妇进门。有《西江月》为证：

孝幕翻成红幕，色衣换去麻衣。画楼结彩烛光辉，合卺花筵齐备。

那美妆奩富盛，难求丽色娇妻。今宵云雨足欢娱，来日人称恭喜。

说这新妇是王公最幼之女，小名唤做三大儿；因他是七月七日生的，又唤作三巧儿。王公先前嫁过的两个女儿，都是出色标致的，枣阳县中，人人称羡，造出四句口号，道是：

天下妇人多，王家美色寡。

有人娶着他，胜似为驸马。

常言道：“做买卖不着，只一时；讨老婆不着，是一世。”若干官宦大户人家，单拣门户相当，或是贪他嫁资丰厚，不分皂白，定了亲事。后来娶下一房奇丑的媳妇，十亲九眷面前，出来相见，做公婆的好没意思。又且丈夫心下不喜，未免私房走野。偏是丑妇极会管老公，若是一般见识的，便要反目；若使顾惜体面，让他一两遍，他就做大起来。有此数般不妙，所以蒋世泽闻知王公惯生得好女儿，从小便送过财礼，定下他幼女与儿子为婚。今日娶过门来，果然娇姿艳质，说起来，比他两个姐儿加倍标致。正是：

吴宫西子不如，楚国南威难赛。

若比水月观音，一样烧香礼拜。

蒋兴哥人才本自齐整，又娶得这房美色的浑家，分明是一对玉人，良工琢就，男欢女爱，比别个夫妻更胜十分。三朝之后，依先换了些浅色衣服，只推制中不与外事，专在楼上与浑家成双捉对，朝暮取乐。真个行坐不离，梦魂作伴。